

茅盾的《乘风破浪》

□姚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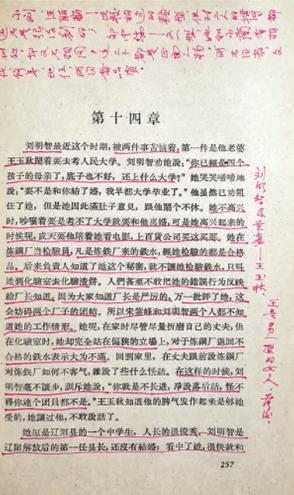
茅盾在《反映社会主义跃进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中提道：“值得我们高兴的，我们看到了以鞍钢为题材的艾芜的《百炼成钢》、草明的《乘风破浪》、罗丹的《风雨的黎明》，这三部小说都出色地塑造了先进人物，也写了人民内部矛盾”，“都写了内部矛盾”“反映的矛盾还有先进与落后，个人主义与集体利益的矛盾”等方面将《乘风破浪》与《创业史》进行了对比分析。在《谈“人情味”——谈《共产党主义的人情味》偶感》中，茅盾又提道：《乘风破浪》也写了主人公（李少祥）的恋爱（而且都写得情长意深，缠绵悱恻）。在《读书杂记》中，谈及冯德英《苦菜花》的部分写道：赵星梅、娟子、姜永泉之间因“误会”而发生的小风波，和草明《乘风破浪》中李少祥、小兰、小刘之间的“误会”又多么相似。

茅盾对《乘风破浪》中的人物、情节的提及与详细分析，可见其是仔细阅读过的，根据这一线索，笔者在茅盾藏书中找到作家出版社1959年9月版的《乘风破浪》，此书扉页无题记，按照《茅盾日记》关于藏书“都是解放后买的或出版社赠送的”的叙述，可以判断是作家出版社赠予或茅盾自己购买。翻阅图书后，发现书中留下了大量茅盾先生的批注笔记。

这些较为丰富的批注内容，既有整体性评价，也对细节描写作了评价。前者如第二十二章末尾留下了三段批注：“许多人物都给一个圆满下场——何大姐和列全的婚姻是其中最不必要的一椿。此章内琐细的叙述，受了旧小说的影响。”“离奇曲折的情节过了一定限度就不真实，但尤其重要的是：离奇曲折的情节必须与人物性格的发展相结合，否则就是为曲折而曲折。小兰和少祥的‘曲折’，从二人的性格发展来看，并不结合得密切的”；“小兰和少祥的婚姻，正所谓‘好事多磨’，而其基础在于（一）双方都不肯先表白自己的

若深入解读草明的《女人的故事》，必先大致了解天马书店《天马丛书》的策划和出版情况。上世纪30年代（1935年—1936年4月），尹庚受天马书店老板韩振业之邀——此前，因楼适夷、叶以群两任编辑先后被捕入狱——曾经主编过一套丛书《天马丛书》。这套丛书包括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两类，原拟出100种，实际上最后仅出版了30多种。出版流产也实属正常，因为当时国民党当局严格的图书审查经常干扰或打断出版社的出版计划。一方面，尹庚是左联成员，由他主编的这套丛书中有许多是左联青年作家的著作，这不能不引起国民党图书审查机构的格外注意。另一方面，最初靠出版左翼文人著作而立足于上海的天马书店本来就是那个时代，虽然出版了大量进步书刊，但其老板韩振业一度谨慎小慎微——凡出书大都走正常报批程序，这样带有左翼色彩的书就更难出版了。加之，韩振业于1935年11月因患中风去世，书店随之陷入困境，故出版流产也实乃必然。

这套丛书封面由画家钱辛稻设计，题名、编者、著者、丛书编号统一用美术字体标示，左下方附有比利时法朗士·麦绥莱勒（Frans Masereel, 1889年—1972年）的木刻画，美术字与西洋版画搭配，显得新颖别致。钱辛稻1912年生于上海浦东，曾在上海洋画研究所学画，并与同仁创办“线上画会”。他为什么选取麦绥莱勒的木刻画？原因可能是：一、为了谋生需要，也为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或反抗。1935年，作为自由职业者，他没有固定工作，而主要以画广告、教画为生；同时，又大量阅读左翼书刊，对当局对外不抵抗政策和对内镇压多有不满。在此背景下，为尹庚的《天马丛书》设计封面，既可获得一笔酬劳，也可在此设计中融入对时局的看法。他之所以采用麦绥莱勒的木刻画版，显然也与彼时境遇有关。其中，麦绥莱勒用黑白画面表达压迫、忍耐与抗争主题，更与钱辛稻（也包括尹庚）产生深度共鸣。二、鲁迅对木刻运动的倡导，也深刻影响了钱辛稻。当时，鲁迅正不遗余力地倡导木刻运动，比如从1929年1月起，出版了《美术丛刊》五种（《近代木刻选集（一）》《落谷虹儿画选》《近代木刻选集（二）》《比亚兹莱画选》《新俄画选》）。麦绥莱勒与比亚兹莱、埃舍尔等木刻家一样，都于上世纪30年代初被介绍到中国。鲁迅曾在《为连环图画辩护》一文中有介绍：“比国有一个麦绥莱勒，是欧洲大战时候，像罗曼·罗兰一样，因为非战而逃出外国的。他的作品最多，都是一本书，只有书名，连小题目也没有。”同时，由赵家璧主持的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也曾出版过《一个人的受难》《光明的追求》《我的忏悔》等木刻画版。因此，同在上海美术界且对左翼文艺界非常熟悉的钱辛稻，对由鲁迅所倡导的这种美术风潮不可能没有关注。须知在当时，从西洋引进的木刻画也是最为前卫的艺术形式之一。作为先知先觉的青年画家，钱辛稻之所以在封面中加入麦绥莱勒的木刻画版，显然与鲁迅的倡导



茅盾在草明《乘风破浪》上的批注

心愿，（二）由于第三者的插入所造成的误会，可是，这两个因素都不可能造成那样的‘曲折’；男女双方的隔膜程度，极像旧社会中封建思想浓厚的少男少女，不大像今天的青年。今天的青年由于自尊心不肯先向对方表示‘迁就’，但不会那样忍受痛苦而不把问题提出来”。后者如第174页的批注：“小刘，汪丽斯——比较相近的类型，但对二人的描写都还不是很深刻的；邵云端——又一型，她和小兰有相似处，却又不相同。这两个都是正面人物，所不同者，文化、修养、地位，所同者品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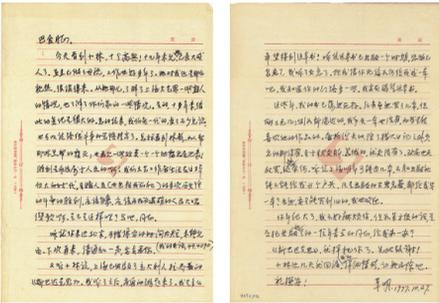
茅盾还对有的章节作了评价，如第九章末尾留下的批注：“这一章写得很好，因为写恋爱、亲子之情等方面，宋紫峰的性格和他在事业方面的性格是一致的，虽然表现方式不同”；第十三章末页的批注：“此章写得很好，从侧面写陈家骏，着墨不多，可是把陈的个性写出轮廓来了。并且又进一步写宋紫峰、汪丽斯、吴凌枫等等。把这三个人的性格进一步刻画出来。”然而，茅盾并没有形成完整的评论文章，甚至在《报告》中都没有独立成段的评价与推介，只是在论述“以鞍钢为题材”时候，对比关于“内部矛盾”写作情况进行了简单地提及。

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许是小说的荡气回肠在茅盾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在之后的《谈“人情味”——谈《共产党主义的人情味》偶感》与《读书杂记》中的冯德英《苦菜花》部分，又提到了《乘风破浪》中的人物与情节。未能在批注的基础上完成“读书笔记”或评论文章，确是一种遗憾。

草明在上海左联时期的老友周而复在《纪念草明》一书的首发式上曾经深情地回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长期地深入工农兵生活的作家中，我最佩服的就是柳青和草明。他们一个深入农村，一个深入工厂，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员）

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草明致巴金书信两封

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书信库中珍藏着草明致巴金书信两封，它们分别写于1977年10月27日和1977年11月17日。从书信时间、内容来看，显然是草明写给巴金的具有连续性的两封书信，且两封书信之间有巴金的回信一封。



草明致巴金书信第一封

第一封：草明致巴金信 1977年10月27日 巴金同志：

今天看到小林了，十分高兴！十几年未见，她已长大成人了。并且已做了母亲，工作也好多年了。她对我还是那么亲热，很谈得来。从她那儿，了解了上海文艺界一些熟人的情况，也了解了你们家的一些情况。是的，十多年来，彼此的变化是很大的。总的说来，我们老一代的，长了不少见识，可以说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总算看到林彪、四人帮那些黑帮的覆灭；也看见一些败类一个个体露出尾巴来！胜利是永远属于人民的啊！我们文艺工作者生活在这样伟大的时代，目睹人民（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多次历史性的斗争的胜利，应该自豪，应该为我们英雄的人民大唱赞歌啊。是不是这样哩？写吧，同志。

听说你来过北京，可惜停留的时间太短，未能见面。下次再来，请通知一声，定去看你。（我的电话：44.4090）

又听小林说，上海已出版了意大利人拉·乔著的《斯巴达克思》，我听了之后，高兴的跳起来了。我是多么希望得到这本书！听说这本书已出版一个时期，恐怕已售光了，我听了更急了。但我请你无论如何给我找一本吧，我知道你的门路多一些。我实在渴望这本书。

这些年，我的书已荡然无存。后来虽然买了几本，但聊聊（寥寥一作者注）无几；例如汤达的，我手头一本也没有，而我是很喜欢他的作品的。屠格涅夫的，除了猎人日记之外其它的都没有。至于狄更斯、屠格涅夫的，就更没有了。现在也无处买，徒唤奈何。听说上海明年可能出几本，不知出版社能不能给我开个户头，凡是出版的古典名著，都给我买一本？当然，要是能买到旧的，我也欢迎。

你年纪大了，我不好麻烦你，但如果方便的话，是否托出版社里的一位年青点的同志，给我办一办？《斯巴达克思》，就拜托你了。先此致谢！

老一辈作家间的深厚友谊

——对草明致巴金书信两封的研究

□田春英

小林过几天就回沪，我的详细情况，让她面陈吧。祝撰安！

草明
1977.10.27

这封书信直抒胸臆，信的内容较长，写了满满的两页稿纸。从信的第一段内容——“今天看到小林了，十分高兴！”“从她那儿，了解了上海文艺界一些熟人的情况，也了解了你们家的一些情况。”“是的，十多年来，彼此的变化是很大的。”——能够让体会草明对多年未见的朋友十分挂念，以及对其他旧友近况的关心，那许久未有音信后相遇的真挚和激动的感情一定是很难用言语表述。

第二封：草明致巴金信 1977年11月17日 巴金同志：

赠书已收到。再一次谢谢你！
赠书你老了、瘦了。今天在光明日报上看见你的近照，觉得你的变化还是不大，精神还是挺年青的。希望你的译作早日问世。

尚此祝
近好！草明
1977.11.17

这两封书信的内容清晰明了，相隔时间不长，第一封多年未见，信的内容丰富，篇幅较长；第二封信虽然字数不多，“赠书已收到。再一次谢谢你！”“日前小林说你老了、瘦了。”“今天在光明日报上看见你的近照，觉得你的变化还是不大，精神还是挺年青的。”“希望你的译作早日问世。”“尚此祝 近好！”字里行间处处表达了对巴金的感谢、关心、希望和祝福。

书信互致见证交往故事

《巴金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开始陆续出版，共26卷，卷帙浩繁，蔚为大观。其中第22、23、24卷为书信集，其中有巴金致草明书信一封，这封书信日期为1977年11月14日。笔者根据这一线索，查阅了馆藏书信信息，值得庆幸的是，这封书信的原件竟然珍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书信库中，它的落款日期只写了11月14日，笔者根据此信内容与《巴金全集》书信集中巴金致草明信的内容比对，确认此信为1977年10月27日草明致巴金书信的那封回信，从时间、内容上构成了与草明写给巴金这两封信的互致关系，也由此完整呈现了两人通信来往的基本情况，勾沉了一段往事。

信的内容如下：
草明同志：

信收到，真是多年不见了。您好吗？小林回来，谈起您对她的关心，很感谢。她已买了车票，明天回杭州。

您要的书昨天才拿到，今天挂号寄上，请查收。用不着寄还书款，是我送给您的。

您信中没有写地址，因此无法早写回信。小林回来后，

我才知道您的通信处。勿复，祝好！

巴金
十四日

草明在1977年给巴金的第一封信中写道：“……十几年未见，……听说你来过北京，……又听小林说，……”等等，巴金给草明的这封回信中说：“信收到，真是多年不见了。您好吗？……”这些信息串联起来，可以理解为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彼此收到书信时，草明和巴金一直是失联状态，互相没有音信，同时也可以认为在失联之前，他们还是时常会有彼此的信息，至少应该不会相隔这么久，因为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就都在上海了，那个时候他们都与鲁迅相识。草明和巴金都是上世纪30年代到的上海，都是围绕在鲁迅身边的青年人。1936年，两人与鲁迅、茅盾等人联合签署《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鲁迅对草明、巴金的指导和帮助，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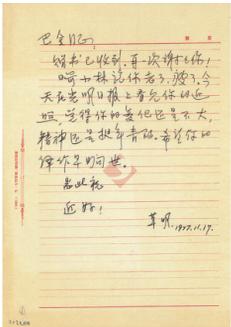
通过书信内容解析

草明和巴金多年未有联系，这次能够书信往来，是通过巴金的女儿“小林”才联系上的。这在草明致巴金第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今天看到小林了，十分高兴！”通过草明与小林的相见，才有了草明与巴金的书信往来。巴金的回信因草明的来信中没有写明通信地址，迟迟未回复，通过小林才给草明回复了此信。书信内容将巴金对草明的问候、感谢、无法早写回信的缘由等说得清清楚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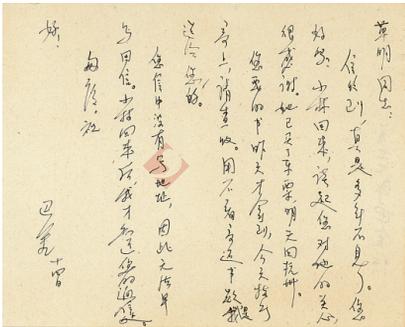
相较于第一封书信，第二封书信是一封字数简短的书信，但内容却很丰富；信中提到了对巴金的赠书表示感谢；从《光明日报》上看见巴金近照，关注巴金的近况；希望巴金的译作早日问世；对巴金的祝福；字里行间能够体会到老一辈作家间的深厚友谊。

草明致巴金的两封去信和巴金致草明的一封回信，都珍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书信库中，弥足珍贵。时隔40多年，我们能够从书信中看到他们亲笔书写的字迹、生活的点滴、时局的变迁等重要而又珍罕的信息，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我们还能将其与书籍信息等相互佐证，还原过去。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员）



草明致巴金书信第二封



巴金致草明书信

版本形态、文本之变与历史风景

——再读草明《女人的故事》

□张元珂

密不可分。

《女人的故事》是草明的第一部小说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九月由上海天马书店（上海江西北西路海宁路北368号）初版，为《天马丛书》第16种，定价二角。初版本无序跋，共68页，封面大小为18.8cm×13.1cm。内收《阿胜》《等待》《有句话要问真他》《一个人不发声的时候》《老怪物》《骗子们》《出嫁》《愤恨》共8篇。草明1932年开始文学创作，且多以揭示旧制度和当局压迫为主题，加之在广州曾参与进步刊物《广州文艺》（欧阳山主办的）的编辑工作，这也就是为什么她在1932—1933年创作的小说多发表于《广州文艺》的根本原因所在。

《天马丛书》每一本的封面都嵌入了不同内容的版面。底封统一印有陈之佛设计的书店店标，《女人的故事》右下方木刻画版绘有青年男女聚会的场景，其中，一双手插入裤兜的男子立于其中，不知所措地四望，其姿态、眼神、心态就很让人遐想。在这个不乏贵妇、美女聚集的地方，他来此地的目的何在？这种形象及画面内容，至少很合乎“女人的故事”之字面意义。不过与之不同的是，《女人的故事》中的“女人”大都是受压迫、受迫害的缙丝女工一类的底层女性形象，而与之相对的“男人”则多为女性悲剧的制造者。1930年代的草明勤奋且多产，先后在广州《文艺》《作家》《文学》《太白》《小说家》《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说。早在1934年，年仅21岁的草明共创作了19篇短篇小说，创作力可谓惊人。她的作品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底层人物形象，反映社会下层人的疾苦、反抗和斗争；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人物心理和风景的描写，以小见大地呈现社会的基本风貌；具有深刻的现实感、思想性；善于以第一人“我”（多是旁观者、不谙世事的孩童或少年）为视点，侧重揭示人生的种种情态。收入这个短篇小说集中的8篇作品都以“人物”为中心，从不同侧面呈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草明家乡（广东顺德）底层民生的生活本相和精神状态。而像《阿胜》《等待》这类作品不仅关注女性命运，还涉及底层民众的革命诉求，正暗合着左翼思潮发展的一个方向。在当时，这类作品如要送审，肯定通不过当局审查关，而版权页上亦无“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颁发的审查证号，故可推测《女人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天马书店的违规出版物。其实，这也是天马书店惯用的手段，或以丛书形式，或以打擦边

球策略——比如出版鲁迅的《门外文谈》，虽也经过当局审查，但没有问题——出版左翼文人的书刊，以获取可观的利润。

草明是左联成员，加入“小说研究会”，经常参加撒传单、贴标语、飞行集会等活动。这种立于“十字街头”的有组织的革命活动很容易暴露身份。1935年3月，草明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后经鲁迅、茅盾、张天翼等人援救，才于第二年2月被释放入狱。可见，这部小说集的策划、编辑、出版与草明本人基本无关。《女人的故事》的诞生很可能是欧阳山一手操办的结果，但所收篇目基本代表了草明在1930年代前半期的创作成绩。这部小说集最初题为“人物速写”——在《梦一样的自由》（欧阳山著，1935年7月初版）末尾页上有《天马丛书目录》，列第16种的为草明的《人物速写》——但在出版时书名改为“女人的故事”。其实，以“人物速写”为题名，也正显示了草明上世纪30年代短篇小说创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即草明是以对形形色色底层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著称的。由于《女人的故事》的编辑、出版正好发生在草明入狱期间，当草明出狱，欧阳山以其当礼物相送时，它就有了不同寻常的纪念意义。它既是修复草明因入狱导致的精神焦虑或伤痛的一剂良药，也是现实中“革命+恋爱”版的情侣故事的最好见证。

另一值得深入探讨的是《女人的故事》在当代语境中文本修改问题。在此，不妨以《草明文集》（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为例，对之稍作说明。《草明文集》第一卷为短篇小说卷，经笔者仔细比对，内文也做了一些修改。除将助词“底”改为“的”外，修改类型主要有：

其一，句法修改。比如，在《阿胜》中，将“他们为什么喜欢这两句话，好像他们是构成完整的重要部分呢，开头在我觉得是难以解释的。”改为“他们为什么喜欢这两句话呢？好像这句话是说明人的命运的重要部分似的，开头我是觉得难以解释的。”在《等待》中，将第7段最后一句话“那以后，高高大大的，说笑起来不时要摸摸鼻子的‘牛犊’李祥就不晓得那（哪——笔者注）里去了”调到该段第二句之后；将“一大队兵士经过腾同村”改为“一大队战士经过腾同村”；将“一个光荣、快乐的名字”改为“一个惬意的名字”；将“你敢咒他，你这黑心狗！”改为“你敢咒他，你这黑心鬼！”；等等。这些修改都属于文法、修辞层面上的修改——或调正句序，或更换词语，

或添加修饰语，都实属必要，属于正向改写。

其二，更换标题。比如，将《有句话要问真他》改为《有句话要问他》，将《阿胜》改为《不听妈妈话的女孩子》，前者为了消除歧义，后者为了突出主题。对于后者而言，不仅改了标题，还将主人公的名字“阿胜”改为“阿凤”。如此一改，既突出其女性身份，又与修改后的标题互为补充，共同揭示一种深刻的思想——妇女要解放，不仅要反抗婚姻专制，还要融入社会，走革命之路。

其三，删除方言。比如，将“……但有些‘生疔’的却望都不望他们一下……”改为“……但有些性情清静的却望都不望他们一下……”（《阿胜》），将“在冬天，给寒气赶跑了，就变成‘青雉’一样，鼻涕无缘无故地淌出来”改为“在冬天，给寒气赶跑了，就变成清的鼻涕无缘无故的淌出来”（《等待》），都是着眼于语言的易懂而做出的删除。这种改写有其必要性，但如不妨碍理解，就没必要修改或删除。方言是作家的第一母语。它进入现代小说，并成为现代文学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要不要、可不可的问题，而是如何探索、怎样实践的问题。草明在此后的修改中，对初刊本中的方言采用删除或同义替换策略，逐步删除了方言在小说语言中的存在。我觉得，这种做法是值得商榷的。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必须拥有独立的语言创生意识。草明在上世纪30年代的小说语言存在较为明显的欧化倾向，且较为单一，而初步萌发的方言意识及实践又在此后的修改中被强行压制，这多少是有些遗憾的。虽然“欧化”一度代表了现代小说语言发展的方向，但在中国现代小说语言发展史上，这也仅仅是诸多实验中的一种，白话、方言、文言、翻译等都是生成“现代小说语言”不可或缺的资源。

左联时期的草明及其创作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它和延安时期、“十七年”时期、1980年代以来的草明及其创作有着怎样的关系，呈现何种特质，有哪些意义，都值得作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但目前这方面学界做得很不够。其实，草明一生有两个创作高峰，即左联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时期，前者以短篇小说起步显示了其在左翼文坛上的实绩，后者以工业题材长篇小说奠定了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而由上海到延安，到北京，再到鞍山，草明的作家身份、语言意识、创作风格都不断发生变化，若要全面深入地梳理或研究这种“变化”，左联时期的草明及其创作是无论如何不能被忽视的，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其左联时期的短篇小说创作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女人的故事》收入此时期创作的8篇作品，但也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若要全面而深入地研究草明左联时期的创作实绩，其他几十篇作品也应重新纳入再解读、再阐释的视野。然而，目前除了一两篇论文外，有关这方面的关注与研究还远远不够。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